

【清明时节】

母亲的眼神

□杨曙明

孙儿的眼神特别像他老奶奶，看到他眼神，我时常想起已经“走”了多年的母亲。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眼神可以透视人之品行。母亲心地善良，待人宽厚，我从未见她有过轻视人的神色，更别说蔑视人的眼神了。母亲是济南卷烟厂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“老工人”，在同事中有着相当不错的口碑，尤其是当年在那些青年工人中，更是有着很高的威望。记得有几个曾经很顽皮、捣蛋的青工，经过母亲热心地传帮带，都成为她的好“徒弟”。他们对母亲十分敬重，说程老师（母亲姓程名秀云）待人和蔼，那看人的眼神，透着温馨、透着真挚、透着长辈的亲情，让你不好意思再调皮捣蛋。在我保存的家庭相册里，有一张母亲胸前佩戴大红花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是母亲获得企业标兵时的留影，当年曾在济南卷烟厂的标兵宣传栏中悬挂过好几年。照片上的母亲，眼睛清澈明亮，眼神真诚慈祥，让人看着极为和蔼可亲。

隔辈疼爱乃人之常情，母亲也是如此。记得我儿子出生那天，母亲下班后，顾不得回家，立马就赶到了医院，与护士说好商量，非得让人家把孙儿抱出来给她瞧瞧。当她把孙儿抱在怀里，那种喜悦的神情，疼爱的眼神，我虽然无法用语言完美表达，却深深铭刻到了我的记忆里。从那以后，母亲疼爱孙儿的那种慈祥、慈爱的眼神，久而久之就成为孙儿小时候心灵愉悦的重要原因。特别是在父亲去世之后，儿子便常住在她奶奶家，时间长达八九年。在那些年间，奶奶照料孙儿，孙儿陪伴奶奶，祖孙俩朝夕相处，母亲那种对孙儿含在嘴里怕化了、捧在手里怕摔着的慈祥眼神，也时常从她的神态中流露出来。

在我的手机里，有一组母亲与重孙儿的合影照片。这组照片拍摄于2016年。那年母亲83岁，重孙儿还不满周岁。照片有重孙儿摸着老奶奶脸颊的，有好似在听老奶奶讲故事的，还有一张重孙儿像是在与老奶奶谈心，在这组照片中，母亲那自然流露出的眼神，充满了天伦之乐的幸福，神情愉悦，慈祥可亲。母亲去世这些年，每每看到这组照片，都能让我和儿子得到些许慰藉。

母亲七十三岁那年，因为双膝关节疼痛难忍，被迫先后做了两次手术。手术后的她，失去了自由行走的能力。由于行动不便，所以一天到晚只能窝在家里。虽然我们兄妹三天两头都会回家看望她，而且还请保姆对她朝夕陪护，但是，我从母亲的眼神中，总能读出她内心的孤独。因为每次我回家，母亲那种高兴的心情，以及期待与我交流的眼神，都表露无遗。可是，那时候我的工作较为忙碌，虽然每每看到母亲那种期盼的眼神，就告诫自己要多回来、多回来，可由于工作繁忙，我多年未能兑现承诺。如今想来十分愧疚，愧疚于母亲晚年未能常回家看看，多陪陪她老人家，悔之晚矣、悔之晚矣……

人是衣服马是鞍，母亲总希望我每天都西装革履、精神抖擞。可是，当年我是个着装较为随意的人，非必要场合都是休闲着装，甚至有时显得多少有些邋遢，为此，母亲曾多次含蓄地对我提出过劝告。2017年初，母亲因病住院。其间，我因为要参加会议，便穿上西装、蹬上皮鞋，打上了领带。那天预备会刚刚结束，因为牵挂母亲，所以散会后我未及换装，便赶到了母亲的病榻前。母亲看到我西装革履，甚是惊讶，继而便流露出欣喜的眼神。那眼神让我终生难忘，如今想起来，好像她老人家仍在用那种眼神看着我。

转眼间，母亲走了已有九年。那是九年前的正月初八。中午，我正在病榻前守护着她老人家，无意间抬起头看到昏迷了几天的母亲微微睁开了双眼，而且眼角还有泪水流淌。那一刻，她的双眼虽已显无神，但我从那眼神中仍能看到她内心的牵挂与留恋，仍然读懂了她对我的期望。我紧紧握住母亲的手，把头凑到她的耳边，轻轻地对她说，放心吧！放心吧！处在弥留之际的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，但她似乎用手回握了我一下。我明白她回握的含义，于是就更加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，并由泪水在脸上流淌。当天晚上，母亲没能熬过第二次抢救，离开了我们。

母亲走后这些年，每逢清明节，每逢她的生日、忌日，我都格外想念她老人家。清明节又要到了，伴着思念，伴着泪水写就此文，以此来祭奠我敬爱的母亲。

□冯宝新

山东省作协副主席、烟台市作协主席王秀梅曾评价高吉波的文学语言“质朴纯粹得如同清风中的一片田野”，具有“窄小的段落、简单至极的短句和跳跃迅捷的笔锋转换”等特点，像“一件质朴却细致至极的精美银器”。这一评价精准概括了高吉波文学语言的特质。以胶东乡土为根脉，高吉波的文学语言通过语言提纯、精神重构、传播普及、生态引领，对胶东文化的文本化、经典化、代际传承产生了结构性影响。

高吉波的文学语言对胶东文化的首要贡献，是将胶东口语、乡土表达从“土话”“方言”提升为可进入文学作品、可全国传播的“文学语言”。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《泰山笔记》《高吉波微语录》等作品可作为“雅化乡土语言”的案例。他对胶东口语进行“提纯”，剔除方言中粗粝、地域性过强的俚语，保留具有生命力和情感张力的部分，达到“土而不俗，俗而能雅”的效果。例如民间俗语“铁匠的儿子会打铁”，他提炼为“铁匠的儿子会打铁，是继承；铁匠的儿子会炼钢，是发展”，使一句俚语成为富含哲理的文学格言。

他大量吸收胶东民间话语的质感：简洁、直白、短促、有力，提纯后的口语具有强烈节奏感。《泰山笔记》中的句子短促干净：“老屋的氛围，搬不走，老屋周边的环境，也搬不走。这氛围，这环境，因此也就成为我日后选择居所的条件：清静。因我不喜欢喧嚣；有水井。我嗜茶，尤其井水冲泡；与山为邻。我爱好养花，倘换盆，山上的腐叶土随手可得。”这种“胶东鼓点”式的语言，让叙述本身带有地域性格。他对“蒸”字的考据，引用《诗经》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”，将文献考据与地方风物联系，使地名承载了多重含义，赋予乡土历史的纵深。

以胶东地区为书写对象，高吉波建立了自己完整的语言范式：短句为主，节奏如“胶东鼓点”。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大量使用短句：“风大，雪大”“我没喝，也没吃”“她把我红肿的小手拉到她的怀里暖和”“真有来世，我把把椅子，让你坐着歇歇”，句式简短有力，符合胶东人“直、实、硬”的说话逻辑，与乡土生活的“粗粝感”相呼应。动词精准，很少堆砌形容词，注重白描叙事。《泰山笔记》中“从春天到秋季，你听到的是鸟语，闻到的是花香，看到的是低吟的蜜蜂和跳舞的蝴蝶”，通过“听觉—嗅觉—视觉”的递进，营造出饱满的感官世界。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中“我已舔净了留在嘴角的米粒”“我跑到河里，破冰给侄女洗尿布”“她把我红肿的小手拉到她的怀里暖和”，动词“舔净”“写尽孩童的饥饿与珍惜”，“破冰”点明酷寒与报恩心的急切，“抱”“拉”“暖和”充满身体的温度，于无声处刻画善良与母爱。

在文化精神层面，高吉波用文字塑造胶东人的“精神肖像”。胶东人的性格常被标签化为豪爽、实在、深沉、重情义，他将其转化为可触摸、可共情的精神内核。他的语言风格本质上是胶东人精神的文本化：“直”如“我没喝，也没吃”，对应“实在、不绕弯”；“硬”如短句“风大，雪

【书里书外】

从泥土里炼出银器



大”，对应“坚韧、抗造”；“暖”如“嫂子留鸡蛋”“抱柴烧炕”，对应“重情义”；“静”如“一张藏了半个世纪的照片”里“母亲每夜试牛儿气息”，对应“内敛、情感深沉”。

作品《一个母亲的老去》中，“出了一身热汗，喝了半瓢凉水……铺毯已被血浸透”，产后即劳作落下一身病，是胶东女性面对苦难的韧性。寒夜让孩子睡在自己肚子上，借新衣维护孩子自尊，细节中流淌着以行动表达的伦理之爱。全文情感克制：“我不知道她的白发在舞动着漫天飞雪，还是漫天飞雪在舞动着她的白发。”无尽的等待、衰老的苍凉，呈现在诗意的沉默画面中。母亲的一生，是胶东大地上一代人的缩影，从缺衣少食到“日子慢慢好过了”，折射时代变迁。她的腰疼、掉落的牙齿、早白的头发，是为家族延续支付的代价，她的“老去”换来了孩子们的“新生”与“远行”，这种代际付出是胶东文化乃至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精神。

高吉波通过文学语言从“地方叙事”走向“国民记忆”，实现代际传承。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等作品通过教材化、影视化与新媒体传播，将胶东文化从“文学圈”推向“全民圈”。

1998年10月25日，高吉波创作的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首发于《齐鲁晚报》，之后不久被《读者》杂志等多种报刊转载。2001年，该作品首次入选《山东中学语文教辅读本》。这篇不足800字的散文，以其质朴语言、凝练结构、白描手法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及教育专家好评。自2001年至今一直保留在全国大学、中学、小学不同语文教材，福建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南、北京、上海等二十几个省市，先后将此篇选入中考语文试卷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止到2025年底，该文入选各类考卷250余套，涉考学生达4.8亿之众，让胶东文化从“地方故事”变为“集体记忆”。

2024年其另一散文《泰山笔记》也入选山东省初中语文教辅读本。《泰山笔记》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两篇散文，自最初发表距今时间都在20年以上。这些作品之所以一直为读者所喜欢，高吉波认为：文学作品唯关爱人性、关爱自然、关爱人与自然，才有生命力。

随着散文《雪地里的红棉袄》“走红”，该作品也引起影视界的注意。经作者亲自操刀改编完成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，是烟台市委宣传部重点关注项目。中篇小说《大酒窖》和长篇小说《城门》也达成电影、电视剧初步合作意向。胶东文化正通过镜头语言实现传播。

现代网络信息量大、传播速度快，高吉波开始创作微语录。他认为散文创作难点在于如何在“实”的基础上升华，微语录这种短小精悍的形式，能够用最凝练的语言直击事物本质。《高吉波微语录》本质是胶东民间智慧的文学提炼，以极简形式通过新媒体进入大众认知，让胶东文化从“文学圈”走向“全民圈”。

高吉波的文学创作，如《大酒窖》《一个母亲的老去》《城门》等，明确指向胶东半岛的海洋性乡土、港口文化、家族伦理，让胶东文学拥有了“独立的美学品格”。